

# 远古时期的通辽

通辽市文博院 孟祥昆 韩光

## 北疆文化视域下的考古通辽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西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西辽河流域全程参与其中，为实证中华文明百万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西辽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有着突出作用，深入研究阐释西辽河文化，对于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等重大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通辽市作为西辽河文化核心区，不仅在地域上处于核心位置，其在西辽河史前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上也具有主脉地位。通过多年的考古发现可知，通辽有着较为完整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包括距今约10000-8000年的南勿呼井遗存，距今约8200-7200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约7200-6800年的新乐下层文化、7000-6500年的赵宝沟文化、6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5500-5000年的哈民忙哈类型和5000-4000年的南宝力皋吐类型。

### 南勿呼井史前时代遗存

1973年，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对扎鲁特旗希嘎图木苏木南勿呼井遗址进行了调查，采集有包括敲砸器、砍伐器、龟背形石器、扁桃形手斧、锛形器、石槌、石球、石镰等，这批石器大部分与山西怀仁鹅毛口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标本相似。据推测该遗址的年代可能为距今10000-8000年，是通辽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一时期遗存的主要特点为居址很不稳定，还未出现大片的房屋和墓地；石器仍以打制为主，磨制技术不精，不见通体磨光石器；农业处于萌芽状态，属于“砍倒烧光”或称为“刀耕火种”阶段。考古学家赵宾福先生认为这些遗存的特点模糊并难以确定文化属性，因此可按国际考古学惯例，将其确定为中石器时代遗存，即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存。

### 兴隆洼文化

兴隆洼文化得名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年代范围为距今8200-7200年。该文化遗址遍布燕山南北地区，分布范围北起松辽分水岭，南到燕山南麓，东起巫医闾山，西抵大兴安岭。通辽地区的兴隆洼文化遗存具有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的特点。目前通辽地区经考古发掘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仅有小奈林稿一处。通辽地区经考古调查的遗址有扎鲁特旗荷叶花遗址、开鲁县小泡子遗址、科左中旗白菜营子遗址等。现有材料来看，赵宝沟文化



子遗址、敖恩布套遗址、西固仁茫哈遗址等。从延续时间来看，通辽地区兴隆洼文化遗存的年代基本囊括了早、中、晚三个时期，表明该文化曾长时段的存在于这一区域内。

### 新乐下层文化

新乐下层文化是主要分布于下辽河流域的一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距今约7200-6800年，因1973年最早发现于沈阳市新乐遗址而得名。通辽的新乐下层文化目前多发现于西辽河以南地区，主要分布于科左后旗，201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科左后旗阿仁艾勒遗址进行了调查，2022年，通辽市文博院在对科左后旗的乌兰图来、门德来等遗址的调查中也发现有相关遗存，表明这一地区曾是该文化的一个重要分布区。科左后旗作为下辽河与西辽河两个文化区的交汇地带，在这里发现新乐下层文化组陶器，说明该文化的分布范围已经不局限于下辽河流域，而是开始向西逐步进入到通辽境内。近年来，在通辽西部的奈曼旗、库伦旗等地也发现有新乐下层文化遗存，说明该文化的西界有向教来河流域推进的势头。

### 赵宝沟文化

赵宝沟文化是辽西地区继兴隆洼文化后兴起的又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为距今5000-4000年。南宝力皋吐遗址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为2006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13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南宝力皋吐墓地外，经过调查的南宝类型遗址有扎鲁特旗荷叶花遗址、科左中旗白菜营子遗址、西固仁茫哈遗址等。南宝力皋吐墓地的发掘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作为西辽河文化核心区的通辽地区已经有一个接近于文明，或者说已经初步进入文明阶段的遗存。

诸多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折射出通辽地区宏富的史前文化特点，同时也侧面展现了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延续不断的表征。通辽地区作为西辽河文化核心区，自史前时代以来就是一个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之地，既是沟通南北的桥梁、也是联结东西的纽带，核心地位十分显著，在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史前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具有特殊地位，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做出了应有贡献。众多史前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同时表明通辽地区有着十分深厚的史前文明积淀，暗示出在史前时代已经初步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成为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

（该文系2025年度通辽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TLSKL202509）



南宝力皋吐墓地出土陶器组合。

## 通辽城的那家旧书店

刘宏杰

近日，通达融媒视频号上一则题为《旧书店的最后一页》的新闻，讲述了通辽市荣梅旧书店及其老板王静涛的故事。视频里，王静涛用朴实无华的话语，倾诉了自己二十几载经营荣梅旧书店的内心历程。他对旧书那份矢志不渝的执着与热爱，深深触动了人们的心弦，引发了广泛共鸣。众多通辽人在看完视频后，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对他的敬佩之情。

那天，我看完这则新闻，当即在评论区写下：“荣梅旧书店里，也藏着我的青春记忆”。与此同时，心中不禁泛起一阵感慨，岁月匆匆，时光飞逝。对我来说，荣梅旧书店是光顾次数最多的书店，书店老板王静涛更是我的良师益友。回想起我们的初次相遇，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2005年秋天，我从旗县来到通辽求学。从未离家住校的我，面对陌生的环境，满心都是不适应，心情也格外地压抑。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一个傍

晚，我偶然发现在内民大西门对面的马路上，一间小平房外挂着“荣梅旧书店”的牌匾。对于自幼热爱读书的我而言，这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迈进这家书店。一进去，我就仿佛置身于一座知识的“宝库”。

书店面积不过三四十平方米，却摆放着许多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旧书。靠墙的书架上，书一直摆到了棚顶，地上也堆起了好几座“书山”，书架之间的过道窄得可怜。看到如此琳琅满目的旧书，我被深深震撼了。虽说屋子看起来有些杂乱，但书籍其实是按照不同类别摆放的，想要找某类书籍，倒也不算困难。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年，我已记不清当天在书店买了什么书，但可以确定的是，那天我收获满满，没有空手离开。

从那以后，荣梅旧书店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去的次数多了，我和老板也渐渐熟络起来，和其他学生一样，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王叔。那时候

我热衷于买旧书，主要是因为旧书价格实惠，而且都是正版。当时通辽的书店不少，卖旧书的书摊也有很多，但对比下来，荣梅旧书店的价格最为公道，种类也最为丰富。更重要的是，王叔为人和蔼可亲，他不仅卖书，更是真正懂书之人。就像他在新闻里说的那样，他是把爱好做成了事业，爱书如命。事实确实如此，许多有价值的旧书都是他从废品收购站淘出来，不少珍贵的学术刊物也因他的悉心保存，才没有沦为一堆废纸。除此之外，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的老物件。

随着和王叔越来越熟悉，他教会了我如何挑选书籍，如何辨别正版书。他对许多作品有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让身为中文专业学生的我都有钦佩。在通辽求学的那几年，我每周都要去荣梅旧书店两三次，每次都收获颇丰。我有幸收藏了1952年出版的《呐喊》，蒙古文学经典《一屋楼》《泣红亭》，还在那里找到了上百册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行的

《当代》《十月》等知名文学期刊。如今，我书房里的大部分藏书都来自荣梅旧书店。

毕业后，我回家乡参加工作，但每次到通辽出差，我都必定要去荣梅旧书店看看。有时候即便不买书，也要和王叔聊上几句。尤其是微信普及之后，需要什么书，还会向王叔咨询。如今，荣梅旧书店早已从低矮的小平房搬进市楼，可一走进去，熟悉的感觉依旧扑面而来。近年来，受网络购物的冲击，书店数量大幅减少，卖旧书的更是寥寥无几。然而，王叔依然坚守着荣梅旧书店。正如新闻里旁白所说：“他守的不仅仅是旧书，更是过去的那个时代，是书有用、惜纸张、抱理想的时代，是一个厚重且慢的时代……”



## 仰望历史的天空

### ——读《史记》随笔

杨冬青



司马迁的《史记》横跨千年，带我们步入从黄帝轩辕氏至秦汉时期的历史长廊，拨开历史上的种种迷团，还其本来面目。

厚重的《史记》让我们在太史公铺设的3000年甬道上，追星逐月，浏览着一幅幅精彩动人的历史画卷。十二本记、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帝王、将相、侠客、巫师、商贾、文人、佞幸之臣相继登场。《史记》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艺术等领域，称得上是一部百科全书式巨著。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用30年的时间，勾勒出3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泣血之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用《史记》向世人证明：人道之上还有历史，历史之上还有天地。

司马迁的成功来自于家学渊源和聪慧的天赋。司马迁年10岁能诵古文，父亲司马谈为他聘请了名师，使之受到良好的教育。其后，他又拜在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天文学大师唐都等泰斗门下，汲取各家学派的精华，又与时贤为友，学问见识日深。公元前126年，司马迁20岁，他怀着承继父业、执笔著史的宏志游历全国，遍访祖国的名山大川，搜求到许多历史故事与资料，为以后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满腹经纶的司马迁，28岁为仕郎中，他伴随汉武帝走遍祖国大地，是为“扈从之游”，立志要建功立业，实现自己报国的夙愿。可是文人的悲剧，就在于太过于书生气，因替李陵辩护，司马迁遭受了腐刑，然而他并未沉沦，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

“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在《秦楚之际月表序》里“究天下之变”，就是借秦灭亡的教训告诫当朝统治者勿要重蹈秦王复辙，弄一个天怨人怒、彻底灭亡的下场。司马迁把前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用人不当，“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贤人乎，贤人乎，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究天下之变，是穷达之变，司马迁通过陈胜之口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些贩夫走卒、佣耕者无一不是穷达之变的受益者，司马迁用调喻的手法直指汉武帝治国之策的荒谬性，如果以损坏农民利益为强国之本，无疑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司马迁举了历史上夏商周更替的教训，举了秦灭亡的教训，抓住历史本质，揭示其深刻性，警示当政者，曲笔剖析，句句中肯，可谓犀利又独到。

《史记》的价价值不仅是它的批评性和讽喻性，它的文学性、欣赏性也是一大特点。《史记》是历史，是文学历史；《史记》是文学，是历史文学。它的文笔生动、朴拙，用语雄健、俊洁、婉曲、细微，善用赋体铺陈叙事，通俗易懂。刻画人物，描写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例如在《张良相如列传》中写周昌口吃，模拟周昌神态说：“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期期”是对周昌又急又怨的神情活灵活现的描写。又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写霸陵尉醉酒，呵止了李广不能夜行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这是模拟装腔作势的醉汉的语言，把醉汉的神态刻画的传神精妙。

另外，《史记》在情节设计方面更具有小说和戏剧化特点，如写《鸿门宴》人物、角色、情节丝丝入扣，写“鸿门宴”紧张气氛，矛盾情节铺垫得合情合理，甚至连每个人的座位都交代的清清楚楚。为了更真实，司马迁还做过实地考察。针对他这种严谨，清初，顾炎武赞曰：“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正因为《史记》的文学性使它的语言通俗易懂，书中的许多成语至今流传，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如《淮阴侯列传》里的“多多益善”，《李将军列传》里的“桃李无言，下自成蹊”，《陈涉世家》里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廉颇蔺相如列传》里的“负荆请罪”“完璧归赵”等成语不胜枚举，俯拾即是。

司马迁写《史记》也是写自己，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他借鲁仲连的舌头喷火，或者变成自挖眼睛的伍子胥，又变成训斥秦王的蔺相如，他在乌江头哭，在屈原坟头哭，实际上在哭自己，哭自己命运的不堪。他痛不欲生，“肠一日而九回”，他多次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可是在生死之间，痛定思痛中做出决择，悟出了人生的真正价值，遂有了震撼千古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的文化伟人，也是世界性的文化伟人，他在中和全世界的文化史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苏联大百科全书》称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历史的天空繁星璀璨，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就是星河中最亮的一颗，他写就的《史记》给炎黄子孙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

■广告

